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

第六十三本，第四分

出版日期：民國八十二年九月

從中國學術傳統論漢語方言研究的 過去、現在與未來

何 大 安

本文檢討漢語方言研究的歷史和現況，著重在指明這些研究與中國學術傳統的關係。本文認為，中國學術中有關方言和語言方面的研究，基本上反映出一種「雅言中心觀」的思想。這種思想不但影響了古代的方言研究，也在無意中影響了民國以來的方言調查和古音構擬的工作。然而一種新的趣向，亦即對語言學理論的興趣，也已經開始出現。這種趣向將會給未來的方言研究，注入新的活力。

一

這篇短文想對漢語方言的研究作一些與學術史有關的考察，希望藉此對漢語方言研究這樣一種學術活動及其發展，取得若干基礎性的認識。然而本文所作的考察，方面其實有限，並不能、也不預備對漢語方言的研究史，作一全面的通論。這樣的通論，讀者可以在羅常培（1934）、易家樂（Egerod 1967）、周法高（1973）、王士元（Wang 1990）、賀巍（1991）幾位先生的報告裡讀到。本文不再重複同樣的內容。具體地說，本文所想考察的，只是下列幾個問題。（一）方言研究在傳統中國的學術史中居什麼樣的地位？受什麼觀念的支配？（二）民國以來這方面研究的主要課題是什麼？何以會選擇這樣的課題？選擇這樣的研究方式？（三）最近二、三十年來，有哪些跡象透露出新的研究方向？以上這些問題只能是學術史中極小的部分，本文所提供的意見，也許會因為不見全

貌而失之片面和武斷，希望讀者指正。

以下就分節討論這幾個問題。

二

中國人很早就把他們對語言差異的認識記載下來，例如：

- (1). 楚人謂乳：穀；謂虎：於菟。（《左傳·宣公四年》）
- (2). 孟子謂戴不勝曰：「子欲王之善與？我明告子，有楚大夫于此，欲其子之齊語也，則使齊人傳諸？使楚人傳諸？」曰：「使齊人傳之。」曰：「一齊人傳之，衆楚人咻之，雖日撻而求其齊也，不可得矣。引而置之莊嶽之間數年，雖日撻而求其楚，亦不可得矣。」（《孟子·滕文公下》）
- (3). 晉人患秦之用士會也……乃使魏壽餘僞以魏叛者，以誘士會。執其帑於晉，使夜逸。請自歸于秦，秦伯許之。履士會之足於朝。秦伯師于河西，魏人在東。壽餘曰：「請東人之能與夫二三有司言者，吾與之先。」使士會，……乃行。……既濟，魏人謀而還。（《左傳·文公十三年》）
- (4). 應侯曰：「鄭人謂玉未理者璞，周人謂鼠未腊者朴（璞）。周人懷璞過鄭賈曰：『欲買朴（璞）乎？』鄭賈曰：『欲之。』出其朴（璞），視之，乃鼠也。因謝不取。」（《戰國策·卷五·秦三》）

上面所引的四段記載，從今天的知識背景來看，(1)、(2)大概是指漢語和非漢語語言的不同，(3)、(4)則說明了當時漢語內部存在著方言上的差異。

然而古代中國人的觀念裡，似乎並沒有方言和語言的區別。「方」是國的意思，他們所說的「方言」，是指「先代絕言，異國殊語」（《方言·卷十三·劉歆與揚雄書》），這裡包括了今天所認識的漢語方言和非漢語在內。和「方言」對立的，並不是「語言」，而是「雅言」。《論語·述而》：「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皆雅言也。」鄭《注》：「讀先王典法，必正言其音，然後義全，故

不可有所諱。」《荀子·王制》：「使夷俗邪音，不敢亂雅。」因此「雅言」就是正音，是標準語，而蒐集「絕遐異俗之語」（《方言·卷十三·揚雄答劉歆書》）所成的書，便可稱為《方言》。所以古代中國在語言差異上，所重視的分別是「雅言」與「俗語」，或「雅言」與「方言」，是「標準語」與「非標準語」，而不是我們今天所說的「語言」和「方言」。古代中國所說的「方言」指的是「非標準語」，既包括了漢語方言，也包括了非漢語的語言。

這種「雅言：方言」對立的觀念，支配了近兩千年來的中國語言研究。首先，在語言和文字的教學上，也就是所謂「小學」，它的目的是「正俗讀」和「識書體」。¹ 當漢代以後，儒家的經典成為知識教育的主要教材，這時如何正確的閱讀和理解經典，便成為語言研究上最為人關心的課題。漢魏經師的「音義」，和隋唐以後的「音注」或韻書、韻圖，都是這種努力下的產品。這些作品中雖然也可能偶而記錄了一些方言的資料，但是這些資料之被記入，乃是附麗於經典，為經典的解釋作引證用的，如：

- (5). 《詩·小雅·瓠葉》：「有兔斯首，炮之燔之。」鄭《箋》：「斯，白。今俗語斯白之字作鮮，齊魯之間聲近斯。」
- (6). 《釋名·釋天》：「天，豫司沈冀以舌腹言之，天，顯也，在上高顯也。青徐以舌頭言之，天，坦也，坦然高而遠也。」
- (7). 《說文》：「聿，所以書也。楚謂之聿，吳謂之不律，燕謂之弗。」
- (8). 《爾雅·釋天》：「螳螂謂之零。螳螂，虹也。」郭《注》：「俗名為美人虹，江東呼零。」

由於這些記錄非常的片斷，它們不是當時人真正研究的對象是很明顯的。

漢代揚雄（53BC.-18AD.）的《方言》，一向被認為是中國古代第一部方言

1 《漢書·藝文志》：「古者八歲入小學，故周官保氏掌養國子，教之六書，謂象形、象事、象意、象聲、轉注、假借、造字之本也。……《蒼頡》多古字，俗師失其讀。宣帝時，徵齊人能正讀者，張敞從受之。」

的專著，然而我必須指出，這部書基本上仍是「雅言：方言」對立觀下的產物。這一點可由這本書的形式上看得出來。例如一開始的兩條是：

- (9). 黨，曉，哲，知也。楚謂之黨，或曰曉。齊宋之間謂之哲。
- (10). 虔，僂，慧也。秦謂之謾，晉謂之懇，宋楚之間謂之捷，楚或謂之譚，自關而東、趙魏之間謂之黠，或謂之鬼。

這本書是以標準語的詞彙——在《方言》書中稱為「通語」——為中心，記載與這個詞彙意義相同的各地的不同說法。這些不同的說法有的反映了同一詞彙的語音差異，有的則根本是不同的詞彙。換言之，這本書仍然是以「雅言」（通語）為主要的關切對象。方國絕代的異語，被打散了分繫在各條通語之下，它們並不曾受到完整的、獨立的對待。

許多學者曾經指出《方言》和《爾雅》的相似性，而《爾雅》正是一部以訓釋經典意義為主的、類似字典的書。這本書在形式上和《方言》完全一樣，也是以雅言的詞彙為中心，分繫各經典的同義語於其下。《方言》、《爾雅》形式上的相同點，固然反映了漢代以「雅言」為中心的方言觀，但是也強烈地影響了後代對方言的觀察方式。在一方面，一些學者們以與《方言》、《爾雅》相同的形式，來記錄他們對當時方言的觀察。著名的如戴震的《方言疏證》、杭世駿的《續方言》、李實的《蜀語》、章炳麟的《新方言》，而唐代詩人李商隱所著於今不傳的一本四川方言的書，書名就叫《蜀爾雅》。²

在另一方面，記載、描寫一個特定地區的歷史和概況的「方志」的書中，對當地方言的描述，也完全採用了《方言》、《爾雅》的模式。它們或者完全依照上述(9)、(10)的辦法來記錄一地的詞彙，或者進一步為一個特別的音讀或語詞尋找古典的來源，例如：

2 這本書著錄於《宋史·藝文志》，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卷三》引《中興館閣書目》云：「《蜀爾雅》三卷。案李邕云：『唐李商隱采蜀語為之。』當必有據。」以上資料引自丁介民《方言考》第99頁。

- (11). 《鎮海縣志·卷三十九·方言》(1879):「驢,讀如閩。《周書·王會篇》有「閩」字,江永曰:『即今之驢也。』案俗呼驢爲閩,猶古音矣。」

更值得注意的,是像這樣的記錄方式:

- (12). 《遵義府志·卷二十·風俗》(1841):「……鼻塞曰呬(原注:音祝)。謂看曰消(原注:鎖平聲)。……詫其多曰夥(原注:音窩)夥。……香圓稻米曰稬米(原注:稬音晚)。……結堅曰凝(原注:音禁)。……」³

“呬、消、夥、稬”不見於《說文》和早期的經典,它們是爲方言中特殊詞彙所造的方言字。然而造字者並不以直音法來對譯方言詞,而是按照漢字的六書原則新造帶義符的形聲字,再直音這些形聲字爲某。這種作法,既爲蛇足,同時也有將漢字的語意系統強加於方言詞彙的不良效果。在六書原則的統一之下,方言的音、義的特點被模糊掉了,而漢字卻因此增加了新詞。「結堅」不直接說「音禁」,一定要在漢字中找一個聲音上毫無關係的「凝」以示同源,再加注「音禁」,尤其把這種雅言中心的心態,表現得格外清楚。

這種訴諸古典的、以雅言爲中心的方言觀或語言觀,自然阻礙了人們對不同方言或語言的客觀研究的興趣。而雅言中心觀的另一個影響,是對方言的排斥。許多人認爲方言(方音)的差異是一種「訛謬」,⁴ 語言學家應該要「以紐韻正音料簡州國訛音」(章炳麟《國故論衡·正言論》)。

明清兩代有一些學者比較能拋開「雅言中心觀」的束縛,客觀地比較方音的

3 《遵義府志》對方言的描述,大體本於明李實(1598-1676)所作的《蜀語》。

4 羅常培《漢語方音研究小史》在這方面有詳細的討論,讀者可以參看。

異同，如張位、胡垣、劉獻廷等人。但可惜他們的作品太少，並沒有在方言的研究上發揮太大的影響。

我們可以說，儘管中國人很早就認識到「言語異聲」的事實，在公元前後就有了關於方言的專著，並且在十六、七世紀就已經有了「時有古今，地有南北，字有更革，音有轉移」（陳第 1541-1617）的主張，可是方言研究在傳統中國並不發達。最主要的原因，乃是中國傳統中有一規範意識和正名主義思想非常強烈的「雅言中心觀」。在這個觀念的影響之下，方言或非漢語少有被單獨完整地客觀研究的可能；⁵ 甚至所留下來的方言資料，也以片斷的，不成體系的居多。

三

民國以來，漢語方言的研究，隨著新的學術課題的開展，有了新的面貌。大致來說，高本漢（Bernhard Karlgren）和趙元任是帶來新面貌的兩個關鍵人物。他們兩人的學術興趣，支配了半個世紀以上的絕大多數的方言研究。

趙元任先生在《現代吳語的研究》（1928）的《序》中說道：

研究中國語音最詳細又最多的，大概要首推瑞典的中國音韻家高本漢。他的成績都發表在 1915-1926 陸續出來的 *Etudes sur la phonologie chinoise*。不過一個全國的方言調查不是個把人一年工夫或一個人年把工夫可以做得完的。高本漢的所得的材料可以夠使他考定隋唐時代的古音的大概，但是假如要做中國的方言志，那還得要許多人許多年有系統的調查跟研究才做得好吶。

這段話很扼要地指出了高本漢和趙先生研究方言的主要興趣是「構擬古音」

5 這不包括一些入主中國的少數民族的語言，他們的語言是當時的「國語」，如北朝的鮮卑語，元的蒙古語，清的滿洲語。這些語言的受到重視，在中國歷史上，是很短暫的。

和「寫方言志」。這兩種興趣為什麼會成為民國以來方言研究的兩大主題，除了他們個人的學術魅力之外，必然有些學術史上的原因。

至少從十六世紀開始，中國的學者們就開始了成系統的對古代語音的研究。這種研究的動機，很大一部分是來自「通經」，也就是研讀古典，解決經典內部的學術問題。隨著清代「智識主義」⁶的興起，古音研究不但成為一個獨立的知識領域，而且因為它的方法論的客觀和嚴謹，這門新興的學科樹立起清代學術的典範。古音學之在清代，就好像歷史語言學之在十九世紀的歐洲。

清代古音學正是一門歷史語言學。明清兩代的古音學家先是以《廣韻》為基礎研究「古音」（上古音），繼而就《廣韻》以研究「今音」（中古音）。到了清末民初，「古音」和「今音」的音韻體系，已經大體完成。後來的研究證明，這兩種古語的音韻體系，可以再作修訂的地方很少。主要的類別已經確立，這門學術的工作似乎已經作完。如果要繼續發展，在確立的類別上進行擬音，便是一種必要的突破。

這種突破由高本漢開始，由今天來看，是極其合理的。高本漢把歐洲十九世紀歷史語言學以比較研究重建古語的豐富經驗，帶進了以恢復古代雅言為宗旨而忽略當代方言研究的中國歷史語言學，使得一方面已經走到盡頭、一方面也累積了大量成績的傳統課題開出新機。中國的歷史語言學和歐洲的歷史語言學各在它們最成熟的時候結合在一起，因此以「構擬古音」為最終目的的方言研究之成為主流，其實正可看作是清代古音學的延續。

二十世紀初，語言的平面研究——歐洲的結構語言學和美洲的描述語言學——逐漸受到重視。我們不敢確定趙元任先生之編寫方言志的決心和歐美平面研究的時興有無關係，但是他的建議成為民國以來方言研究另一主流的原因，卻值得我們進一步探討。

寫方言志，也就是對方言作平面的描述和研究，理論上可以有各種方式。這些方式包括記錄哪些語言現象，用什麼表述法（representation）來表述這些現

6 參看余英時 1977。

象。換句話說，就是用什麼「理論架構」來寫方言志。儘管有過建議，⁷ 批評，⁸ 也有過不同的嚐試，⁹ 大家看得出來，趙先生之後中國方言學界採用得最多的、最主要的，是1948年出版的《湖北方言調查報告》的描寫模式。《湖北》模式的特點有三：一是以音韻為主，詞彙、句法的分量極小；二是所記錄的是「單字音」，而不是活用中的語式；三是音韻的描寫和分析以《廣韻》為參考架構，超出《廣韻》或中古音系統以外的音韻現象，如輕聲、詞組間的連調變化，以及韻律上的特點（prosodic features）如音長，句調，輕重音等都極少注意到。趙先生對這種模式曾經有過這樣的說明：

我們有時候還是脫不了“研究前人所研究或前人所創造之系統”的習慣。所以我們從頭起總還是以《切韻》系韻書作為一切方言研究的出發點。……在全國幾千方言當中要得他一個大概的觀念，那麼惟一的以簡御繁的方法就是拿《切韻》系統之下的單字音作起點。以後再慢慢給某種方言的語詞做詳細的長篇記錄。（趙元任 1951:62）

值得注意的是：以一個古音系統來研究方言的目的，是要對全國的漢語方言先得一個大概的觀念。以古音系統研究方音，會對全國的方言得出什麼樣的大概的觀念呢？簡單的說，我們會很快的掌握住這些方言與古音系統之間的距離，了解到哪些方言從古音的角度看比較接近，哪些語音變化從古音的角度看比較特別。換句話說，我們能夠因此找到每個方言在古音演化上的系譜性（genealogical）的位置。那麼趙先生的主張顯然是：在對全國的、或大多數的漢語方言先得到了

7 例如林語堂（1923）曾建議要使方言研究有「偉大的結果」，必須做到：(1)考察音變，(2)以廣韻為起點，(3)利用發音學的方法，(4)注重俗話而略於字音，(5)尋求音變規則，(6)尋求詞彙的正確語源，(7)博求俗語中的古語，(8)研究文法，(9)考察方言句法異同，(10)尋求俗語中新的文法傾向。他的建議，後來有許多並沒有充分的做到。

8 例如比利時賀登崧神父（William A. Grootaers）的批評，見趙元任 1951 所引。

9 明顯的例子如趙元任 1928，1951，魏建功等 1935，董同龢 1948，白滌洲等 1954，河北省昌黎縣縣志編纂委員會等 1984 等。

系譜學的認識之後，再加強各方言詳細的長篇記錄。

這個主張雖然只是暗示性的提到，我以爲卻是極爲符合中國的方言研究的環境的。表面上看來，高本漢方言研究的旨趣是歷史的，趙先生是描述的，但其實在相當大的程度上他們都正好呼應了傳統「雅言中心觀」的語言研究。高本漢是以方言去詮釋雅言，趙元任是以雅言去衡量方言。當然，「雅言中心觀」的價值偏見可能已經沒有了——這種偏見的消失，或者說對客觀知識的尊重，是清代智識主義的傳統和民國以後西方學術的輸入所共同造成的——在民國以來方言研究的兩大主題上，它已轉化爲一種對「語言系譜學」（language genealogy）或語言發生學（linguistic genetics）的純知識的興趣。

四

漢語方言的研究，在今天已經成爲一門純粹的專業知識。上文固然指出了方言研究與傳統語言研究之間思想脈絡的聯繫，但是我們也注意到，隨著這個知識體系自然地加深拓廣，有一些不同方向的努力正在進行。這些努力，爲方言的研究注入了新的精神。

首先，在傳統的課題上，以王士元、丁邦新、鄭錦全、張琨、羅杰瑞和徐通鏘爲代表的幾組研究最引人注目。王士元（Wang 1969, Matthew Y. Chen and W. S-Y. Wang 1975, W. Wang and C. C. Cheng 1977）從漢語方音的歷時變化中提出了著名的「詞彙擴散」的理論。丁邦新（1982）、鄭錦全（1988）爲方言分區分別提出了音變性質和量化方法的客觀依據。丁邦新（1984）利用變調推求原調的努力，爲語言的內部擬測拓開了新路。羅杰瑞（Norman 1973, 1974, 1979）從方言比較、方言與古音比較、方言與非漢語比較構擬古閩語，擴大了方言史的領域。張琨（1984）及一些年輕朋友對語言層的討論，突破了從前文白二分的單純觀念，認識到漢語方言「層積性」的特點及其意義。徐通鏘（1991）則將文白異讀的替代過程概念化爲「疊置式音變」，爲傳統的音變理論注入新說。

與上述研究相對立卻又相關的，是已故的橋本萬太郎教授的類型學的研究

究（1979, 1985）。他對東亞語言的「畜牧型」：「農耕型」的總體性觀察，在方言研究上極具啓發性。

以上這些研究之所以值得注意，是因為他們雖然從傳統的論題出發，但是研究的成果並不限於個別問題的處理，還有著理論上的豐富意義，尤其是在歷史語言學和語言類型學兩方面。漢語的方言如此衆多，漢語的經驗，自然有許多與其他語言共通的地方，可以因之建立起關於人類語言的系統性知識。理論的建立，可以說是順著清代以來漢語研究逐漸專業化的一種趨勢，而正由於上述的研究從傳統處紮根，能夠吸取傳統的豐富給養，它所帶來的影響也必因源遠而流長。

論題雖非傳統，但是同樣具有理論深度的，有 Wang (1967)、Yip (1980)、Chan (1985) 爲代表的幾組研究。這些研究的特點是理論性很強，往往論題即產生自理論本身，而研究的目的，也在於希望對既有理論有所匡正。漢語方言，無疑地正是這些研究可以取材的寶庫。同時，懷抱著不同理論上的問題來看漢語方言，會使我們在傳統論題的關切點之外，發現新的語言事實，爲漢語方言研究的多元化，增加更多的助力。

事實上，學者們也正努力的發掘新的語言事實。例如最近十多年，大家注意到方言中有著各式各樣的變韻、變音、變調和重疊式、加不同詞尾的構詞方式等等。最受人期待的是繼趙元任 (1926) 之後，朱德熙 (1980, 1985)、梅祖麟 (1988)、余靄芹 (1988) 所領導的方言比較語法的研究。方言語法，幾乎是漢語方言學中一片未開發的領域。任何一方面的研究，歷史的、描述的、或是理論的，都能令我們對漢語方言的認識耳目一新。此外 1979 年《方言》季刊的創刊，1989 — 91 年《中國語言地圖集》的出版，更有劃時代的意義。前者象徵漢語方言研究之爲一種專業學術的確立，後者則代表了趙先生「全國方言志」的一個初步的總結。這兩件成就，無疑也催促我們在方言研究上，應該再作一次階段性的省思。

五

任何一種形式的研究或理論，背後都有一個決定此一形式的形上基礎。這種形上基礎，可能為採用此形式的人所熟知，也很可能因習焉而不為人所覺察。本文對自古及今漢語方言的研究，不採取羅列記數的觀察方式，而企圖指出影響或決定這些研究的基本精神。我們認為：中國歷代語言研究的主要傳統，是一種雅言中心的語言觀，因此方言研究並不發達。民國以來方言研究所著重的歷史的與描述的兩大主題，基本上可以看成是雅言中心觀和傳統研究課題的轉化和延續。由於東西學術交會的適逢其時，同時知識專業化的趨勢已經形成，因此方言的研究一時鼎盛。近二、三十年來，隨著研究的加深，理論的興趣，色彩漸濃。我個人以為，無論是從漢語中提煉出新的理論，或者是根據漢語去驗證或修改一個既存的理論，這種建立抽象知識的努力，會日益增加而成為一個具有影響力的新方向。

在另一方面，我也希望從事方言研究的工作者，能夠不斷地對支配自己研究工作的形上基礎有所反省、批判、和超越。只有這樣，我們才能不為成見所束縛，才能發現更多、更有意義的語言現象。

陳澧（1810－1882）是清代末年極重要的音韻學家，他在《切韻考》中所提出的中古音系和研究方法，受到廣泛的推崇。他是廣東人，曾經寫了一篇著名的《廣州方音》的文章，他特別提到：

廣州方音合於隋唐韻書切語，為他方所不及者，約有數端。余廣州人也，請略言之：平上去入四聲，各有一清一濁，他方之音，多不能分上去入之清濁。……廣音四聲皆分清濁，故讀古書切語瞭然無疑也。

四聲各分清濁，那便是有了八個聲調。然而當時的廣州話卻並不只八個聲調。1877年 Ernest John Eitel 所編的《A Chinese Dictionary in the Cantonese

Dialect 》，提到了九個調。平上去各分上下（陰陽），入聲則分上入、中入、下入（xxvi），並以「竹、捉、濁」分別代表三個入聲。Eitel 甚至還提到平聲除了上下平之外，還可以再分出一個帶“quickness and jerkiness of enunciation”的“中平”。這些現象和今天的廣州話完全一樣。可是陳澧聽不見，他只聽見了四聲八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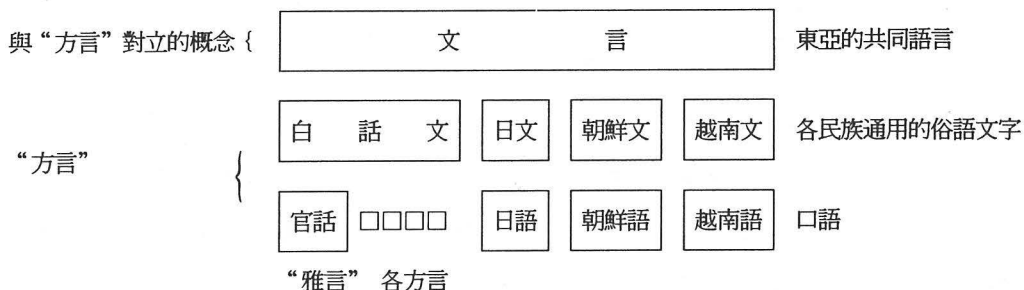
這個例子說明，一位偉大的音韻學家，當習慣了某一種看問題的方式之後，對一些明顯的語言事實，也會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的時候。

（本文於民國八十一年五月七日通過刊登）

後 記

本文初稿曾經丁邦新師、李壬癸師、張以仁師及鄭錦全、梅祖麟、陳韻珊、洪惟仁、平田昌司、王洪君諸位師友賜閱指正，非常感激。平田先生在來書中對於十九世紀以前的東亞語言社會有所評論，至為中肯。現在徵得同意，附載於此，以與本文互參。

「關於“方言”和“雅言”的對立，我也曾經考慮過幾次。如果畫成圖表，19世紀以前的東亞的語言生活是：



現在已經不再存在最上層的書面共同語言，因此這幾個國家的人聚在一起討論問題時不甚方便（取代文言的，恐怕就是英語）。但在19世紀以前，日本學人和朝鮮學人完全可以利用文言交流雙方的學術思想。我認為與“方言”對立的，並不一定是“雅言”，而是“文言”。趙元任先生曾在‘What Is A Correct Chinese?’中強調，國語運動以前的中國似乎不存在全國通用的發音，“正音”僅在某一個方言的範圍之內成為問題。《方言》的關切對象，也不一定是“通語”本身，而可能是古籍訓詁。如果相信《方言》是揚雄所作，雄“斟酌其本，相與放依而馳騁云”，可以把《方言》視為《爾雅》的一種增注本。在近代，創設國語講習所（？）時有一位老儒題字“普及方言”（出處不確），可見在這位先生的心目中官話也屬於“方言”的範圍之內。竊以為與其說“雅言”方言對立，不如說“（世界通用的）文言”和方言對立。

章學誠《文史通義》中有一處把梵語稱為“方言”（現在手頭無書，不知在哪一篇），跟清末“方言學堂”相類似的用法。小川環樹先生曾指出，宋人詩話注中的“方言”即指白話等等。（如《九家注杜詩》注文有幾處用例）

關於古代和近代的研究方法的不同，我個人認為有下面差別。

		古代的方法論						近代的方法論			
經學		希臘		拉丁							
古典研究	○	○ ○ ○				○		○ — ○ — ...			
語言	○	○	○	○	○	跟的過	○	○	○	○	...
文學	○	○	○	○	○	其關去	○	○	○	○	...
史學	○	○	○	○	○	它係密	○	○	○	○	...
哲學	○	○	○	○	○	學不切	○	○	○	○	...
	中國	法國	英國	..國		科如。	中	法	英	..國	

兩種模式，一縱行、一橫行。二十世紀的各個學科都希望自律地發展，擺脫舊學的框架。例如研究中國語言學的學者大部分都願意為普通語言學做出一點貢獻，把主要的精力集中在語言的研究，不再兼顧文史（據說史語所也有不少人希望能創設獨立的語言所，正跟近代學術潮流相呼應）。當然，這樣的學術態度有很大的優點，至少在語言事實方面“通”。但也有缺點，往往忽略一個文化體系的特點（我曾戲說，語言研究可以容納在廣義的禮學中。因為說話的就是人，人離不開一個文化系統。）

19世紀以前，橫行的學科大概只有古典研究。印歐比較語言學、結構主義等開橫行的風氣，其淵源就在於此。

我們今後需要發展的方向，也許是縱橫兩向平衡發展。不過，極難。

近代的研究方式，也許可以提起賀登崧的語言地理學。他的研究不幸未能在中國充分進行，但從他對日本方言學的貢獻看，本來應該有更大的成績。」

引用書目

- | | |
|---------|--------------------------|
| 《毛詩·鄭箋》 | 嘉慶南昌府學十三經注疏本 |
| 《左傳·杜注》 | 嘉慶南昌府學十三經注疏本 |
| 《孟子·趙注》 | 嘉慶南昌府學十三經注疏本 |
| 《論語·鄭注》 | 嘉慶南昌府學十三經注疏本 |
| 《爾雅·郭注》 | 嘉慶南昌府學十三經注疏本 |
| 《戰國策》 | 四部叢刊本 |
| 《荀子》 | 四部叢刊本 |
| 《方言》 | 四部叢刊本 |
| 《釋名》 | 四部叢刊本 |
| 《漢書》 | 武英殿聚珍本 |
| 《蜀語》 | 巴蜀書社黃仁壽，劉家和等校注本，1990，成都。 |
| 《說文解字注》 | 經韻樓本 |
| 《遵義府志》 | 成文出版公司中國方志叢書本 |
| 《祿勸縣志》 | 成文出版公司中國方志叢書本 |
| 《鎮海縣志》 | 成文出版公司中國方志叢書本 |
| 《東塾集》 | 菊坡精舍本 |
| 《國故論衡》 | 浙江圖書館刊章氏叢書本 |

丁介民

- 1969 《方言考》，台灣中華書局。

丁邦新

- 1982 〈漢語方言區分的條件〉，《清華學報》新 14.1,2:257-237。
1984 〈吳語聲調的研究〉，《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55.4:775-788。

何 大 安

白滌洲，喻世長

1954 《關中方音調查報告》，北京，中國科學院語言研究所。

朱德熙

1980 〈北京話、廣州話、文水話和福州話裡的“的”〉，《方言》
3:161-165。

1985 〈漢語方言裡的兩種反復問句〉，《中國語文》1：10-20。

余英時

1977 《論戴震與章學誠》，台一版，台北華世書局。

余靄芹

1988 〈漢語方言語法的比較研究〉，《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
59.1:23-41。

河北省昌黎縣縣志編纂委員會，中國社會科學院語言研究所

1984 《昌黎方言志》，上海教育出版社。

周法高

1973 〈二十世紀的中國語言學〉，《香港中文大學學報》1:299-323。

林語堂

1923 〈研究方言應有的幾個語言學觀察點〉，見林語堂著《語言學論叢》：239-248，1933年，上海開明書店；1967年，台北文星書店台一版。

徐通鏘

1991 《歷史語言學》，北京，商務印書館。

梅祖麟

1988 〈漢語方言裡虛詞“著”字三種用法的來源〉，《中國語言學報》
3:193-216。

張 琨

1984 〈論比較閩方言〉，《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55.3:415-458。

賀 巍

- 1991 〈漢語方言研究的現狀與展望〉，《語文研究》3:1-10。

鄭錦全

- 1988 〈漢語方言親屬關係的計量研究〉，《中國語文》203:87-102。

董同龢

- 1948 〈華陽涼水井客家話記音〉，《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19:81-201。

趙元任

- 1926 〈北京、蘇州、常州語助詞的研究〉，《清華學報》3.2:865-917。
1928 《現代吳語的研究》，北平清華學校研究院。
1951 〈台山語料序論〉，《歷史語言研究所傳所長紀念特刊》:61-66。

趙元任，丁聲樹，楊時逢，吳宗濟，董同龢

- 1948 《湖北方言調查報告》，上海商務印書館。

橋本萬太郎

- 1979 〈現代吳語的類型學〉，《方言》3:196-200。
1978 《言語類型地理論》，東京，弘文堂。〔《語言地理類型學》，余志鴻譯，1985，北京大學出版社。〕

魏建功，舒耀宗，胡榮，劉復，白滌洲

- 1935 〈黔縣方音調查錄〉，《國學季刊》4.4:35-85。

羅常培

- 1934 〈中國方音研究小史〉，《東方雜誌》31.7:141-153。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and Australian Academy of Humanities

- 1989-90 《Language Atlas of China》（中國語言地圖集）。Hongkong: Longman Group (Far East) Ltd.

Chan, Majorie Kit Man（陳潔雯）

- 1985 《Fuzhou Phonology : A Non-linear Analysis of Tone and Stress》。
Ph.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何 大 安

Chen, Matthew Y. (陳淵泉) and W.S-Y Wang (王士元)

1975 < Sound Change :Actuation and Implementation > , 《 Language 》
51:255-281.

Egerod, Soren (易家樂)

1967 < Dialectology > , in Thomas A. Sebeok ed. 《 Current Trends in
Linguistics, Vol II : East Asia and Southeast Asia 》 91-129. The
Hague, Mouton.

Eitel, Ernest John

1877 《 A Chinese Dictionary in the Cantonese Dialect 》 . London,
Trubner and Co.

Karlgren, Bernhard (高本漢)

1915-26 《 Etudes sur la phonologie chinoise 》 . [《 中國音韻學研究 》 ,
趙元任, 李方桂, 羅常培譯, 1940, 上海商務印書館]

Norman, Jerry (羅杰瑞)

1973 < Tonal Development in Min > , 《 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
1:222-238.

1974 < The Initials of Proto-Min > , 《 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
2:27-36.

1979 < Chronological Strata in the Min dialects > , 《 方言 》 4:268-274.

Wang, William S-Y (王士元)

1967 < Phonological Features of Tone > , 《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mer-
ican Linguistics 》 33.2:93-105.

1969 < Competing Changes as a Cause of Residue > , 《 Language 》 45:9-
25.

1990 < Theoretical Issues in Studying Chinese Dialects > , 《 Journal of the
Chinese Teachers Association 》 25:1-34.

Wang, William S-Y (王士元) and Chin-chuan Cheng (鄭錦全)

1977 < Implementation of Phonological Change : The Shuang-feng Chinese Case > , in W.S-Y Wang ed. 《 The Lexicon in Phonological Change 》 148-158. The Hague, Mouton.

Yip, Moira (葉美娜)

1980 《 The Tonal Phonology of Chinese 》 . Ph.D. dissertation, MIT.